

書名:《許進雄古文字論集》

作者:許進雄

出版: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0 年 2 月

頁數:622 頁

許進雄(1941—),臺灣高雄人,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下簡稱臺大)中文研究所,在學中受業於金祥恒(1918—1991)、李孝定(1918—1997)、屈萬里(1907—1979)諸先生,深於文字、甲骨之業。1968 年受聘於加拿大多倫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遠東部,負責整理館藏的商代甲骨文字。1977 年起在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中國文字學、經學史、中國古代社會等課程。許先生於 1996 年任臺大中文系教授,2006 年轉任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中國文字學、甲骨學、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物等課程。許先生對甲骨研究特別專精,發現以甲骨鑽鑿型態為根據的斷代方法,被中國河南省安陽博物院甲骨展覽廳評為對甲骨學有貢獻的二十五名學者之一。作者著作甚豐,計有《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68 年)、《卜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明義士所藏甲骨文字》(多倫多:安大略省博物館,1977 年)、《中國古代社會》(臺北:商務印書館,修訂本,1995 年,有中、韓、英文版)、《簡明中國文字學》(臺北:學海出版社,修訂版,2002 年)、《古事雜談》(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 年)等十多本專著及四十多篇論文。北京中華書局為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近年致力於出版海外學者,特別是臺灣學者的著作,以收交流互勵之效。今中華書局出版《許進雄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使海內外學者得見許先生詳稽博辨之文,並進一步認識其

跨學科綜合分析之法。本文嘗試分析論文集之特色,以助讀者窺其堂奧。

(甲)按發表時間為順序,展現作者研究 重點及整個學思過程

先賢嘗謂讀書首當審其序跋,精思細讀,乃可得其書旨泰半,誠哉是言也!若《太史公自序》、《說文解字序》等諸篇,熟讀慎思,可貫通書旨。許先生之論文集亦如此,審視論文首篇《我的研究生涯(代序)》,可知其編著之要旨、學問之源流、為學之次第、研究之問題、著述之種類,可謂得其學問之端緒矣。作者謂本論文集收錄論文以時間先後為序,是其治學成果的總結,展現出其不同時期的研究重點和整個學思過程。簡言之,論文集集中展現許先生研究的成果與發展,對瞭解作者的治學態度和方法,以至其獨特的研究方向和創見,均是極重要的參考資料。

(乙)論說綿密詳盡,舉證多樣而表現形式豐富

1. 論證豐富,正反申述,深具說服力

科學論說之文,得失高下在乎舉證之博富,論說之精闢。作者於各篇論文展示其豐富的論證,舉凡各種古籍文獻、出土器皿、民俗傳說,以至物理、醫學、地理、氣象、化學等現代科學知識,取其合者而用之,可謂雜引百科,用裁得宜。可貴的是,作者每以前人研究為基礎,先以古文獻比較探究,解說文字,常先以《說文》為張本,而以考古器物及現代科學知識加以修正,深得張舜徽先生“研究金文、甲文,必以《說文》為基礎”之旨,這使論說更為圓滿,少有論說不周之處。^[1]

《從古文字看牀與病疾的關係》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10期,1985年9月),表現作者雜糅古今百科知識,取其可用者,合而分析,並加以反復申述,正反論說并用,使論證豐富充實,深具說服力,令人難以辯駁。作者認為,文字是人類用作記錄和溝通的工具,往往反映創作時人們的生活環境和日常用具,以及古人的習俗。如果今人能從古人的心態,通過古人的文明深度去考查創造的文字,更易體會古人創字的用心。由此可見作者相當重視從文化、民俗的角度,以及社會發展的背景知識去理解古人造字的原意。本文以甲骨文“宿”和“疾”兩字造字含意的異同為起點,指出其主要分別在於寢具的不同。“疾”字像一人躺於牀上,有明顯淌汗的病徵。作者在討論過程中,除引用一般的文獻材料外,更引用頗多建築、考古材料,如討論古人的防潮、防濕設施和先秦時期牀的發展時,引用楊鴻勛《仰韶文化居住建築發展問題的探討》、祁英濤《中國早期木結構建築的時代特徵》、石璋如《殷代的夯土、版築與一般建築》等建築及考古研究材料。作者通過基礎物理知識作出推理和論證,推論春秋時代還有不少人睡於地上(頁366,《許進雄古文字論集》,下同)。在論證古人習慣把快要病死的人放在牀上時,作者詳細引述臺灣近代習俗,指出其和古代華北中原民俗的密切關係,推論牀是古代臨死者的安放處(頁368)。作者認為,由於春秋戰國以後醫療水平的提高,春秋以後平均壽命大幅提高,直接引致古人漸漸把牀當作日常寢具,於此作者以多項古代醫學的考古資料作論據,說明牀的功用的變化(頁369)。觀此文可見作者取材之廣,論說之周詳慎密。

2. 觀察入微,能發現重要關鍵綫索

裘錫圭先生(1935—)曾講述考釋古文字之方法,認為考釋古文字要結合古今的方法和材料,運用字形和文例作分析,並充分掌握字形規律。^[2]這要求學者具備豐富的學養和清晰的頭

腦,並能在比較探討中發現綫索,從微細的差異和特徵中找出綫索及答案。許先生圖熟掌握“因襲比較法(對照法)”、“辭例推勘法”和“部件(偏旁)分析法”等考釋方法,在本論文中充分展現其運用之靈活,並顯現作者觀察入微之處。如在《工字是何形象》(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23期,1997年12月)一文中解說作為製作和使用工具的“工”字的造字意義:工具本身及其使用者,是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範疇,“工”字造字意義的探討亦因此聯繫到古代工藝技術的發展情況。文中先列舉歷來學者的說法,並提出疑問和反駁,繼而表示較贊成其中一說——築夯土之杵。^[3]其討論涉及探討“攻”字裏作為敲打工具的“工”字偏旁的含意,從而列舉一系列有關手持曲柄“殳”部件敲打的動作的25個字(頁554—556)。作者通過對這25個字的考察,對其中有“工”字偏旁的四個小點更作深入的探討,並由此推想“工”字是個樂器形,準確地說工字的創意取自石磬之形,其論據主要來自出土的古編鐘及出土銅器上的樂器圖案。工字取形於樂器之說甚有創意,大異於往昔諸家之說,作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字形中小點的意義能窮究其由,其謹慎細密而客觀的治學態度,實足供後進學人取法。

3. 形式多變,圖例及列表清楚明晰

在學術論文中,若適當地以列表、描繪、景印、照片、解剖結構圖等作為文章插圖或附錄資料,實能有效地加深讀者對文章的理解,並給予讀者材料豐富、表現方法活潑的良好印象。本論文集在探討問題時,運用各科知識範圍廣闊,加上作者經常觀察、研究大量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故大部分論文往往附有各類資料列表、數據表、甲骨描本、實物景印(如甲骨、古劍)、漢墓壁畫照片、青銅器鑄造模具解剖結構圖等,使讀者可以實物跟論文內容參考對照,加深對論證過程的瞭解。如在《五種祭祀的新觀念與殷曆的探討》(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41期,1971年9月)

一文中，作者認為，商代王室祭祀祖先的實錄，自然顯示其月日安排的實際情形來，提供了殷人布曆根據的綫索。作者在研究第五期背甲上的一些五種祭祀卜辭後，曾嘗試重新編排帝乙、帝辛祀譜，驚異地發現一些令人想像不到的規律，看來似乎與天體運行的現象或與殷人布曆的考案有關（頁 139）。為證明其發現，作者以圖表展示嘗試排列的帝乙、帝辛的祀譜（頁 145—151），先詳細列明各項甲文及其出處，繼以列表詳細列明帝乙、帝辛的祀譜，並引領讀者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五種祭祀的創制一定有一些意義和殷曆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祀周可以代替曆法使用（頁 151）。

（丙）所收論文既有專題性專科論文， 亦有推廣普及古文字學之作

1. 甲骨斷代、商代祭祀及殷曆問題的考證和探究

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是甲骨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自董作賓先生提出十項斷代原則後，後繼學者或不斷努力探求其他斷代方法，或繼承董先生的原則而加以發揚。其中羅衛東先生撰文肯定董先生確立甲骨斷代標準的學術意義，認為這標準是探求漢字演變規律，掌握漢字演變面貌的重要手段。^[4]學者對斷代標準各持異說，但基本上皆認為董作賓先生之說較完整齊備，是主要的斷代標準原則。如謝濟先生曾撰文，對林澐先生認為甲骨文字體是斷代的“唯一”標準提出質疑，並指出董作賓先生的十項標準才是行之有效的原則。^[5]有些學者則探求新的方向和標準，如陳練軍等根據轉換生成語法的原理，通過研究祭祀動詞在各期的分布，以建立斷代標準。^[6]另一些學者則集中在難以斷代的帝乙、帝辛的問題上，如陝西師大的王暉等，^[7]本書作者許

進雄先生則提出另一項新的斷代標準——“鑽鑿”(《鑽鑿對卜辭斷代的重要性》，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37期，1970年9月)。

商代祭祀的基本規律是許先生經常探討的研究課題，這規律和殷曆，甚至商代王位繼承均有直接關係。本書《對張光直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的幾點意見》一文(曾發表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1965年)，指出張光直先生(1931—2001)的分析結果不合乎事實。張光直先生以人類學的交表婚觀點來解釋商朝的王位繼承法，作者以為張氏選擇史證不够慎重，且未能正確讀解甲骨文。許先生文章先以列表展示張先生“兩大集團”輪流繼承王位之說，俾讀者能瞭解其說(頁36—37)。然後以甲骨文卜辭世系及《史記·殷本紀》商王繼位次序的王位繼承世系表，對照張先生繼承系統之說，許先生的資料表列清楚明晰，使讀者知所去取(頁37—38)。在分析對比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四王世序時，許先生表列《殷本紀》、《三代世表》、《世本》、《古今人表》等各家說法，頗能理清析說理路，有助許先生證實其觀點(頁41)。值得注意的是，許先生在證明儒家正名說與“母以子貴”的關係時，羅列《春秋》中記載妻葬名號的記錄十六則，論證充足(頁45)。文章最後對張先生之作提出四點疑問，分析甚為詳盡。探討商代祭祀的有《甲骨卜辭中五種祭祀祀首的商討》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22期，1966年12月)，許先生仔細比較甲骨材料後，提出以“翌”為祀首的看法，甚具創見。五種祭祀指五個祀典，是一種緊密完整、連綿不斷的祭典，董作賓先生名之為五祀統。董先生提出“彡為祀首說”，陳夢家先生從其說。島邦男則針對董先生的論據缺失而提出“祭為祀首說”。作者於二家之說有所存疑，於是引用多條甲骨卜辭作為論據。為配合其說，作者以四個附表列明資料，四個附表為《翌為祀首，祀為祀統時》、《祭為祀首，祀為祀統時》、《彡為祀首，祀為祀統時》及《祀為王及位年時》(頁62—65)。

作者從而提出以“𡵓”爲五種祭祀之祝首此一較“𡵓爲祀首說”和“祭爲祀首說”更恰當的看法。

2. 通過古文字深入淺出地分析古代社會制度、習俗

人們通過古文字可認識古代文化的各個面貌，並從廣闊的文化歷史層面，對古文字作出多角度的全面的審視和整理。近年興起的“文化文字學”，便是以文化學的觀點來分析語言文字現象。據今人劉志成所述，“文化文字學”的內容主要是研究語言文字的發生、演變及其與文化之關係。它從文化的各方面：思維、哲學、政治、宗教、民俗、稱謂、服飾、建築、飲食、生產、科技、藝術等，探討文化各層面和語言的關係。文化文字學主要有兩個觀點：（一）以文化的觀點看文字，研究華夏文化對漢字的起源、演變規律、結構形成的作用；（二）從文字角度看文化，探究漢字的性質和功能對華夏文化的適應程度，以及漢字對華夏文化的反映和作用，從而判斷漢字的前途。^[8]

許先生在多篇論文裏，均從“文化文字學”的理論和角度審視古文字，運用多種最新的學科知識對古文字的造字意義及演變作全面的闡述。古代祭祀對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對宗教、政治、思想、社會制度等，均有深遠的影響，探求古文字中祭祀的名稱，是研究古文字的演變及古代文化面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在眾多祭祀儀式中，“𡵓”祭是源於原始宗教的古老祭祀方法，它是眾多祭祀方法之一，其流傳和影響極爲廣泛和深遠。西周時𡵓祭十分盛行，東漢以降，雖然儒、釋、道三大宗教磅礴於中國社會，並滲透入普通大眾的生活之中，但作爲原始宗教儀式的𡵓祭，在民間仍然十分流行。中國的原始宗教有廣泛的民衆基礎，生命力旺盛，其中𡵓祭便是典型例子。^[9]許先生以數篇論文，從“文化文字學”的角度探討“𡵓”字的涵義及它和古建築，以至政治制度的關係。《說𡵓》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13期，1964年9月），分析“𡵓”字本義及其字形變化規律時，

把商代各期甲骨文中的“𡇗”字字形表列,清楚展示其化衍之迹。作者廣引典籍,留心經史注文,從中找出頭緒,如分析“𡇗”祭與封禪的關係時,引用《禮記·禮器》經文“因名山升中於天”之鄭箋及孔疏,理據詳明(頁31)。《𡇗祭、封禪與明堂建築》(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19期,1966年3月)一文,解說“𡇗”、封禪和明堂三者間的關係,對解釋明堂用途甚有創見。文中引用民族社會學家的觀點,指出古代房屋和祀火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如引用李宗侗先生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所說,指出中國古代的主乃出自祀火,這顯示作者能從廣闊的文化角度剖析古文字。

3. 學術與普及并重,對深入研究及推廣甲骨學大有裨益

推廣文字學知識,使甲骨文廣為大眾接受及認識,進而促進群眾通過古文字加深對古代歷史文化的理解,是古文字學者的重要工作之一。推廣古文字知識,既應注意論點的準確性,亦要顧及內容和文字的可讀性,收到“雅俗共賞”的效果。由於收錄在本論文集的文章都是發表於學術期刊的專業論文,有別於《古事雜談》等一類普及性著作,故行文較嚴謹細密,論證詳盡而術語亦多。然而,部分文章語言較通俗易懂,術語較少,但採取論證豐富,涉及多種現代學科知識,方便大眾讀者閱讀瞭解。有關文化制度的文章多深入淺出,對古文字研究者或一般大眾讀者都具可讀性,使能各取所需。

《識字有感一》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1期,1980年3月)裏,作者解釋“桑”與“喪”的關係,通過“喪”字從甲骨文、金文、小篆的變化,以《儀禮》、《左傳》、《詩經》等典籍及漢印和漢磚作考證,得知甲骨文“喪”是“桑”的借字。第二部分解釋“庶”與“燮”、“變”的關係,作者為論證“庶”是燃石燒食的會意字,引用臺灣貓公阿美族的石煮及竹煮法作例證,證明三字的確是古代先民石煮及竹煮的會意字。除從民俗學角度分析文字演

變的過程，作者亦從地理氣象學的角度解釋竹煮在華北流行的原因：創字時華北氣溫平均比現在高 2℃ 左右，華北先民普遍運用石煮和竹煮的飲食文化確實曾存在。此文正反映作者能通過多角度釋解文字，展現古代人類的日常生活面貌。

（丁）從社會民俗學、考古學等不同學科 觀點出發，對古文字作綜合性考釋

唐蘭先生（1901—1979）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已指出，科學客觀的文字學研究，應建基於豐富而價值高的材料，更應以踏實的治學態度加以研治，通過多種現代的學科知識互相配合，以一定的客觀標準為規矩，這樣才不會“趨於拘守成說或恣意放言”，能“建立起是非的標準，并開闢出研究這一學科的新途徑。”^[10] 唐蘭先生強調治學研究需有科學客觀態度，儘量以多學科知識從不同角度探討問題，在當時抱有先進的治學態度。現今科學一日千里，學者更應持有唐先生的信念，運用現代各種先進知識研治文字學，而許先生能實踐唐先生的理念，把跨學科知識運用在探討文字學上。康殷先生（1926—1999）亦曾在《古文字學新論》裏提出今後的學者應以多學科知識的跨學科方法，對文字學進行綜合分析和整理，并詳細列出各項古文字的研究方法。^[11] 可見不同時期有卓識的學者皆認為以多角度及跨學科知識研治文字學的高度重要性。許先生的論文皆能實踐二先生的期望，而大部分的文章論述中，大都用民俗學的相關知識。民俗學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過語言和行為傳承的各種民俗事象的學問。這種事象表現為一種傳統的文化模式，供人們模仿和傳承。可以說，民俗學就是研究這種民俗文化模式的學問。^[12] 許先生的諸文章，大都以這種“民俗文化模式”作為分析探討的基調。

例如,在《鹿皮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一文(曾發表於《大陸雜誌》第59卷第2期,1979年8月)裏,作者從《春秋》與《儀禮》等文字記載,探討鹿皮與婚姻制度的關係,繼而引述臺灣阿美族的創生傳說,把鹿皮、伏羲女媧傳說和婚姻制度三者間的關係作出分析探討。作者在分析過程中運用了語言學、社會民俗學、考古學等諸科學知識,並參考漢代壁畫資料,對人類創生傳說作出一綜合性、多角度的析述。比較純以文字資料及文字學觀點角度作出分析,作者能以多學科知識作多角度分析,並見作者能靈活運用各種知識,融會貫通的互相印證,令其論證深具說服力,亦表現這正是作者論著的風格特色。《追尋長生與其社會意義》一文(曾發表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大安出版社,1993年)中,作者探討春秋時代開始至秦漢間,古人追求長生不死的思想。春秋時期的金文大量出現“萬年無疆”等一類希望活得長久的辭句,意味著春秋時期人類壽命的延長是可以達到的願望。延長壽命的主要方法是醫療保健,作者引述數種有關醫學和考古的引文,如耿鑒庭《堯城商代遺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和 Vivello Frank R. 著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社會人類學》) 等文章裏有關商代醫學雖已發展,但水平并不高。作者又引述杜石然等人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裏有關舊石器時代北京古猿人壽命不長的資料,來比較春秋戰國時代醫學技術的高度發展。由此可見,作者能以多種學科材料審視古文字和古文化,展示客觀而嚴謹的治學和研究態度,是值得鼓勵和推廣的。

結 論

本論文集收錄的學術論著,充分展示作者在治學研究中,以多種學科知識來探討、審視古文字材料。這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態度和方法,能讓研究者充分運用現代各種先進的學科知

識,包括理工學科知識,對古文獻材料作出客觀、科學的整理和研治。比較歷代學者採用的以文獻互證的方法,以至如王國維先生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作者運用現代的各種學科的科研知識,對古文字及文化作全面的審視和重點的深入探討,在文字學的理論和實踐上是極具科學性而大有進步的。要知道,堅實的學科理論和知識須基於客觀而開放的科研態度,這一種務實的科學態度始於清代學人的樸學傳統,繼而有王國維、章太炎(1869—1936)、顧頡剛(1893—1980)、楊伯峻(1909—1992)等諸先生的繼承和發揚。其中如楊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其中廣徵材料,充分展示以科學的研究方法研治文史材料的卓越成果。楊先生展現客觀而嚴謹的治學態度,殊於後學大有裨益,可為規矩楷模。而今許進雄先生一若楊氏,可謂承先賢之業,而啟後之學人矣。

香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研究生 翁餘漢

注釋:

- [1] 詳見張舜徽:《愛晚廬隨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8,“研究金文甲文,必以《說文》為基礎”條。
- [2] 裘錫圭:《考釋古文字之方法(講稿)》,《甲骨文學會會刊 創刊號》,(1993年2月),頁167至168。
- [3]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四冊,頁742至754。許先生及諸家有闕“王”字之說,另詳見“附錄”列表。
- [4] 羅衛東:《漢字的斷代測查對漢字史研究的意義》,《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1年5月第23卷第2期),頁129至132。
- [5] 謝濟:《甲骨文分期斷代的標準問題——與林漢先生商榷》,《殷都學刊》,

(2007年,第1期),頁33至35。

- [6] 陳練軍、賈燕子:《甲骨文多祭祀動詞句型斷代研究——多祭祀動詞句結構分布與甲骨文分期的關係》,《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10月,第23卷第10期),頁77至80。
- [7] 王暉:《帝乙帝辛卜辭斷代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第32卷第5期),頁65至76。
- [8] 劉志成:《文化文字學》(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3至10。
- [9] 趙興彬:《祭考》,《泰安師專學報》,(1998年3月,第11卷第1期),頁12至14。
- [10]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頁1至9,《古文字學導論·自叙》。
- [11] 康殷:《古文字學新論》,(北京:榮寶齋,1983年),頁431至435,第四章《今後的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 [12] 陶立璠:《民俗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8。